

· 专题研究 ·

土耳其的近代化: 一般道路与特殊问题

王三义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 奥斯曼帝国上层人物推行的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揭开了土耳其近代化的序幕, 土耳其开始了从传统农牧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这也是近代其他落后国家曾面临的共同选择, 所走的一般道路, 并无特殊之处。然而, 从奥斯曼帝国瓦解到土耳其新生, 这一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完全不同。影响土耳其近代化的主要因素包括: 生产关系变革的自身条件不足, 自强改革运动走了弯路, 社会经济转型的阻力大于动力; 在世界体系中的“半边缘化”地位的制约。奥斯曼土耳其特殊的地缘环境、特殊的政治宗教因素, 以及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严重后果, 决定了土耳其社会发展的步伐和走势。

关键词: 土耳其; 近代化; 一般道路; 特殊问题

拥有古老文明的封建国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 传统社会秩序被打乱, 被迫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开始, 不同程度地迈出“西化”的步伐, 这是亚非近代史的一条主线。以奥斯曼土耳其为例, 基本上能反映东方近代社会变革和近代化¹ 道路的一般特征。不过, 奥斯曼帝国特殊的地理位置, 决定了它在近代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与东方其他国家不同。奥斯曼帝国有数百年统治近东的历史, 也有过挑战欧洲的历史, 最后承受的是遭欧洲欺凌的历史。奥斯曼帝国是疆域辽阔的穆斯林帝国, 宗教和文化因素与众不同。虽然面对列强胁迫, 险遭瓜分, 但奥斯曼帝国始终保持主权的完整和独立, 并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 仅仅是部分行省或属地(如埃及)被列强占领。直到1914年奥斯曼帝国卷入世界大战, 本土和属地被英、法、希腊等国军队侵占, 阿拉伯行省在战后变成了英国和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对土耳其民族而言, 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通过凯末尔领导的革命, 摆脱了旧帝国政教合一的统治, 也驱逐了西方列强的势力, 由此获得了新生, 并进行了彻底的世俗化改革, 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现代国家。

一、旧帝国的“自身衰败”与“半边缘化”

正当西方崛起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殖民活动的时候, 奥斯曼帝国军事优势丧失后开始逐步走向衰

收稿日期: 2010-03-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期奥斯曼帝国史专题研究”(09BSS008)

作者简介: 王三义,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世界近代史、中东史。

¹ 本文的“近代化”, 大致相当于“早期现代化”概念涵盖的范围。对土耳其而言, 真正的现代化始于1923年共和国建立和凯末尔改革, 但此前的奥斯曼帝国时代已有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尝试。

败。从16世纪后期到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社会结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均没有大的改变,庞大的帝国肌体已衰弱不堪,但还在一厢情愿地幻想用武力重铸昔日的辉煌。当时政治腐败,宫廷政变不断发生,帝国的行政管理机构瘫痪,政局不稳定;军事采邑制不能延续,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为了弥补财政亏空,素丹不断增加税收项目,提高税收数额,下层民众不堪重负。同时,教派纷争,民族矛盾激烈,帝国已危机四伏。

从经济方面看,首先是原来的土地所有制发生转变。有些采邑成了私有财产,有些变成了“瓦克夫”(寺院财产)。同时,包税人和地方官吏设法大量兼并田产,使得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由于重税,或由于战乱,也导致土地荒芜。土地分配制出现较为混乱的状态。¹ 其次是国家财政窘迫。对外征服本是奥斯曼帝国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但1699年之后自己成了被征服的对象,不仅不能掠夺财富,而且要维持庞大军队的军费开支。其三,17-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官僚机构与社会生产脱节,官吏对生产者的控制有所削弱。农业方面,由于包税制的推广,统治阶层和农民之间的联系不再紧密;包税商任意勒索农民,农民不能得到政权保护。在城镇手工业方面,自17世纪起,政府不能为手工业者提供资金保障,对手工业部门的控制也越来越力不从心。由于农村经济衰退而导致大批农民纷纷涌入城市谋生,例如在伊斯坦布尔,市政府在保证对居民的粮食充足供应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城市人口剧增,治安混乱,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④ 更为严重的是,当政府对生产和税收的控制越来越弱时,行省首脑和地方实权人物却有了扩展自己势力、施加自己影响的广阔空间。^⑤ 政府直接控制下的农村地区缩小了,地主或部落首领控制的区域则扩大了,奥斯曼政府征税的税源减少,国家税收收入随之减少。其四,农业收成不稳定,农民生活艰难;传统手工艺没落使得匠人们无以谋生;商业受到冲击以及主动权被外国人控制,国内商贩收入减少,生活贫困化。

从政治方面看,奥斯曼帝国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除了伊斯坦布尔及附近地区外,许多行省脱离中央的实际控制,无论是行省总督还是统治行省的军事集团,他们有独立的财政权力,在有些行省,总督职位以世袭方式继承。在帝国的边远地区,一些当地部族首领向素丹的权力发出挑战。统治西亚、北非和巴尔干达数百年的奥斯曼帝国,到18世纪末期已经呈现出全面的经济衰退、政治腐败和低效。从事现代化研究的学者将这种“症状”称之为“自身衰败”。^⑥

在奥斯曼土耳其“自身衰败”的同时,外部环境的压力和威胁增大。新航路开辟和商路转移,对奥斯曼帝国的生存和发展极为不利;欧洲的崛起及强国对海权的控制,对奥斯曼帝国形成包围,尤其是沙俄对奥斯曼帝国造成直接的政治军事威胁。英、法等国的经济渗透和商品冲击,使奥斯曼帝国的海外市场缩小,出口锐减,经济发展受阻。西方殖民地生产的廉价产品充斥奥斯曼帝国各地的市场,甚至连原来从近东出口到西方世界的许多产品,也在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生产,再由西方的商人卖到这里来。由于东地中海贸易的主动权被西欧人控制,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贸易权利逐步削弱。例如,俄国人先取得了商业特权,绕过土耳其首都直接进行民间贸易,其他列强也得到同样的权力,控制了奥斯曼土耳其的商业市场。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还受到战争的威胁,不得不增加军费,无疑加大了财政负担。与历史上的外族入侵不同,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使奥斯曼帝国行省和属地先后被并入世界范围的商业和金融体系中,这一过程是通过机械运输、人口迁徙、资金流动和国际贸易的急剧扩张实现的,奥斯曼帝国处于现代化理论家所说的“边缘化”或“半边缘化”地位。奥斯曼帝国面临的现实是:在西方的竞争下本地产业衰退;帝国实行的经济政策受国际贸易协定和条约的限制;举借外债、财政破产,欧洲人通过公债管理机构控制了奥斯曼帝国的税收,事实上促使帝国丧失了经济上的独立而保留了表面上的主权独立,以至于一些西方学者指出,从19世纪开始奥斯曼经历的是从衰落走向崩溃的过程,称作“现代化”过程是值得怀

¹ Sir Hanilton Gibb & Harold Bowen, *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 part 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253.

^④ Bilal, pp. 36-37.

^⑤ Resat Kasaba,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8, pp. 14-15.

^⑥ 借用罗荣渠先生关于中国晚清帝国“自身衰败”的说法。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54页。

疑的。¹ 从奥斯曼土耳其当时所处的外部环境看确实如此。不过,土耳其的近代化就是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中开始了。可以说,奥斯曼帝国出现“自身衰败”的过程,是整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经历“半边缘化”的过程,也是土耳其的近代化阶段。

二、世纪性改革实践与土耳其近代化历程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早于世界上其他落后国家,且改革持续时间较长,从1792年塞里姆三世军事改革,马哈茂德二世改革(1809-1839)、“坦齐马特”时期(1839-1876)的改革,到哈密德二世时期(1876-1909)的变革,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1909-1918)的变革,整整一个世纪都处于“变革中”。尽管许多改革没有取得明显或持久的效果,但并非徒劳无功。这里按照时间顺序,把近代化进程中的大事,尤其是一些开创性的改革措施,做概括梳理。

第一阶段:塞利姆三世旨在建立西式军队的改革。

措施包括:引进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按照欧洲方式训练军队,建立新式正规化军团,学习和采用新的战术等。为此,建立了几所陆军和海军学校,聘请法国军官做教练和顾问,在军校开设炮术、防御工事、海战等内容的课程。同时改建炮兵工厂、枪械厂等,试制新式武器。塞利姆三世下令扩充新式军团,在帝国实行普遍征兵以代替直到那时还沿用的募兵制。新式兵团的士兵全部采用欧洲新式的来福枪,并完全按照欧洲战术科目进行训练,他们穿欧式军服,全体官兵一律实行薪给制。

第二阶段:马哈茂德二世的全面改革。

政治领域:将原有的帝国行政机构改换成西欧模式的政府部门,设立了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农业部、外贸部、公共工程委员会,各部分别设立内务大臣、外交大臣、财政大臣等职位,这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开创之举。马哈茂德时期剥夺了那些军队独立、财政和司法独立的贝伊和帕夏的权力,同时削弱宗教权力,加强对行省的控制,重申素丹对全国的统治,并促使奥斯曼帝国首次朝着建立现代统一国家目标前进。

经济领域:马哈茂德二世完善了税收制度和管理体制,1831年废除了采邑制,宣布不再给政府官员分封采邑或授免税田。同年开展了全国人口普查(埃及和阿拉伯半岛没有实行)和土地丈量工作,对财产进行登记,派专人负责征收直接税。通过增收关税、向瓦克夫征税等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这次改革触及了传统的瓦克夫制度。同时,鼓励发展商业和外贸,为后来的经济改革播下了种子。马哈茂德二世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废除封建制度,没收封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随着封建主阶级的削弱和完全依赖国库的放债人数量的减少,重振帝国的道路上的深层障碍被拆除。^④

军事领域:主要措施是在军队中实行文官管理制度,使“塞拉克斯”只有军事指挥权,防止军队为将领所控制,发生军事政变。

教育方面:改革的主要措施是设立各类学校,开展西方式教育。马哈茂德二世不顾各方反对,毅然效仿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向欧洲派出大批留学生(其中主要是帝国的青年军官),学习军事、科学技术和西方思想文化。这些人才回国后成为各部门的中坚力量。为了学习外国语言和科学知识,提供对外交流的机会,奥斯曼政府在欧洲各国设立使馆等机构,在国内设立翻译局。由于国内兴办世俗学校受到宗教势力反对,政府采取变通的方式,在宗教学校开设非宗教课程,如外语、数理、生化等课程。

社会习俗方面:改革措施包括:军队改穿统一的欧洲军服;政府官员一律戴“费兹帽”,穿统一的官服(欧洲式的马裤、黑皮靴、礼服大衣;推行欧洲式礼仪等)。在政府倡导下,欧式的家具和生活用品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市民家中。

第三阶段:“坦齐马特”时期的改革运动。

最重要的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管理上的中央集权,扩大政府部门职能,完善地方管理

¹ Irvin C Schick, & Ertugrul Ahmet Tonak, *Turkey in Transition: New Perspectiv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9.

^④ Alfred Bonne, *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London: Toubner and Co Ltd, 1998, pp. 10-11.

制度。把“最高司法委员会”改称“国家委员会”，监督政府实行改革，并在很大程度上节制苏丹的权力。省级管理仿照法国的府县制，在省以下设立区（“桑贾克”）、县（“卡扎”）、乡（“纳赫伊”）建制。¹ 每一级设有“管理委员会”。改革的最后成果是制定了 1876 年宪法，试图建立君主立宪制。“坦齐马特”时期颁布新民法、新刑法；以法国法典为蓝本颁布了商业法；建立民事刑事混合法庭。1858 年颁布了新土地法，确认了土地实际占有者的使用权、继承权和自由处置权，实际上等于确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1861 年首次编纂有关采矿的法规。1869 年，依据法国 1810 年的采矿法，制定了一套新规则。后来建立矿业部（1887 年），随之对采矿税有了明确规范。“坦齐马特”时期还有一项重要举措：1845 年，帝国政府成立单独的警务部门，学习西方国家的模式，把警务和国防严格分开。此后，帝国警务部门正式承担治安任务，不再依赖军队。

第四阶段：哈密德二世时期的改革。

苏丹哈密德二世的统治以“专制”出名，但他并非反对改革和西化。著名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认为，哈密德二世是一个积极推行现代化改革的人，是坦齐马特改革派的真正继承人。^④ 在哈密德二世时期，坦齐马特改革的各项措施都得到实现。一方面，哈密德二世的专制登峰造极，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无论高等学校规模还是在在校生总数都有极大的增长。例如 1877 年改组和扩建了米尔基耶学院，增加了现代科学的课程，还扩充了原来的陆军学院、医学院等。

第五阶段：宪政时期（1909—1918）的改革。

1908 年，反对专制、恢复宪法的革命运动取得成效，哈密德二世被迫同意恢复宪法。帝国议会举行了选举，各民族代表参加了选举。1909 年哈密德二世被赶下台，新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完全听命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奥斯曼帝国进入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统治虽充满暴力、专制和阴谋，让帝国内各民族人民失望，但 1909—1918 年间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例如，这个时期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现代行政管理机构，进行了土地改革，鼓励地方企业发展；法律改革（包括婚姻法的颁布）取得进展，社会习俗改革和文化教育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尤其西方社会思潮传播的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关于历次改革的成败，我们可以做一个简要的概括。首先，改革是逐步深化的。从简单的引进西方技术，深入到制度改革和教育改革；从单纯的军队改革，扩展到司法、管理、税收、社会习俗各个方面。其次，改革虽然没有使奥斯曼帝国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有些改革措施出台不久就被废弃了，但不少局部的、具体的改革收到成效（如农业、商业、税收、司法等）。最为关键的是，经过几代统治者的努力，以西方模式构建现代国家的理念和实践从此开始。当然，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是为国家存亡而改，为解决迫切的问题，本来就不是以纯粹发展经济为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社会财富没有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未能提高，全面改革的成功也无从谈起。而且，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运动是从上层开始的，引入帝国的新的方法和制度，有些不适应奥斯曼帝国的国情。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社会，还是不能用突然的方式使它接受现代工业制度。^⑤

总体上看，通过奥斯曼帝国一个多世纪的改革实践，一定程度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准备了基础，包括世俗化的基础、宪政制度的基础、司法和行政管理的基础、私有制的基础、现代税收制度的基础、现代工业的基础、现代科技的基础等。虽然奥斯曼帝国的封建制度根深蒂固，专制统治不曾减弱，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旧制度与 16—18 世纪的旧制度已有极大的差别，20 世纪初的奥斯曼旧制度只是外壳，新因素在萌发，而且破壳之势不可阻挡。可以说，凯末尔的改革是有根基的，并非“凿空”之举。我们的教科书中，重点评价凯末尔本人和凯末尔主义“扭转乾坤”的作用，很少提及凯末尔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假如说没有奥斯曼帝国一百多年的西化改革实践，土耳其社会能否接受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都成问题。土耳其近代改革实践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¹ 杨增耀：《试论奥斯曼帝国近代的三次改革》，《西北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第 66—71 页。

^④ [英]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89 页。

^⑤ William Yale, *The Near East: A Modern Histor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9, pp. 32—33.

三、土耳其近代化的不利因素及特殊问题

土耳其近代化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分析近代化各环节的不利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社会经济基础薄弱、起点低,甚至不具备生产关系内部变革的条件。

“西化”改革前,奥斯曼帝国经济落后,农业生产技术停留在中世纪早期的水平,就连水力磨坊、风力磨坊这些简单的科技发明都没有普及。由于农业地区的灌溉系统不完善,作物品种不丰富,农业投入少,作物产量低,农民生活贫困。由于城镇手工业规模小,基础差,资金少,分散经营,只能满足当地需求;随着西方工业品进入奥斯曼帝国市场,传统手工业受到严重的冲击。按经济史家的说法:传统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也处于长期均衡状态,¹因而没有大的突破和发展。商业方面,中世纪东地中海的商业优势到奥斯曼帝国中后期已经丧失,尽管部分地区贸易仍然活跃,但已不能把握转运贸易和远程贸易的主动权。奥斯曼帝国的商业资本不像西方那样以自治城市为据点独立经营,而是处在封建官府的控制之下,承受苛重赋税的盘剥。帝国境内的土地所有者兼营商业,或者,商人也是大地主,商人经济实际上从属于地主经济。这种情况下,原有牢固的经济结构就不易被打破。近代化的启动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奥斯曼帝国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原来的生产关系没有变动,内部变革的条件并不具备。要进行社会变革,也只能靠仿效和引进西欧模式。

第二,奥斯曼土耳其的自强改革运动走了弯路。

当时自强改革的实践途径是:先引进技术,制造西式武器,建立西式军队,其次才扩展到发展工商、促进贸易。后来,少数政治精英才认识到要改革政治制度,建立法律体系。自强改革运动中开办了一些西式工业企业,但以国家垄断的军工企业为主,这类企业的经营方式落后,管理企业的是官僚而不是拥有生产管理经验的企业家,不能按经济规律办事。技术落后,生产成本必然高,其结果往往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耗费资财而无大的效益。无论奥斯曼政府还是埃及行省创办的工厂,都和中国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做法一样:在没有任何配套的基础设施,没有现代化生产技术和管理人才的条件 下匆匆上马,机器设备、金属器材、技术指导全依赖国外。这种急功近利的以军工为主的建设,“不可能推动形成具有一定声势的工业化浪潮”。^④ 奥斯曼帝国引进产品,但不仔细研究进口的产品,也不模仿和应用;不像日本人那样认真研究进口产品,把工艺应用到生产中。此外,封建官员和社会上层人士对国家财政问题和社会财富问题的认识也有局限性。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都用来维持军队和庞大的官僚机构的费用,几乎没有“增殖”国家财富的观念。国家收入的来源单一,就是税收;财政开支主要用于各类消费,很少投入生产和建设项目。另一方面,在奥斯曼社会,土地被视为唯一财富,不仅地主阶级努力占有土地,官僚、商人、小企业主也把多余的钱用来购置地产,不愿投资于有风险的商业。奥斯曼帝国地域广阔,交通运输落后,人们生活于几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领域——部落、乡村、城市,因信仰、种族、语言的差异而分为不同的生存群体或集团。在经济基础和文化观念改变之前,凭着素丹颁布的法令,要把欧洲的政治制度搬到这个地方很不现实。^⑤ 奥斯曼统治者改革的每个阶段,都遇到不同程度的难题,甚至出现矛盾和冲突。政策的实行也受到多方面的制约,改革要考虑平衡各种力量,正视各派的反应,还要考虑欧洲人的态度,^⑥ 统治阶层中一部分保守势力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反对任何变革;宗教上层人物害怕经济变革会触及伊斯兰教的神圣地位,他们往往成为经济变革的阻力。过多的阻碍因素致使改革时进时退。

第三,奥斯曼土耳其社会缺少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些必要条件。

西方学者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概括为:商业发展、远程贸易、市场经济(世界市场)、科技运用于商业和工业,以及与此相关的条件,如世俗教育、中产阶级力量、政权组织形式等。奥斯曼土耳其只具备

¹ [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梁小明译:《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页。

^④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增订版),第303页。

^⑤ William Yale, *The Near East: A Modern History*, p. 40.

^⑥ Irvin C. Schich & Ertugul Ahmet Tonek, *Turkey in Transition: New Perspectives*, p. 10.

了部分条件,无法形成合力。自18世纪以来直到帝国解体,土耳其社会没有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从希腊独立到巴尔干诸国的纷纷脱离帝国,使帝国的欧洲部分丧失。埃及起初闹独立,后来被英国占领,而北非其他领土也被法国和意大利占领。在西亚,阿拉伯人的反抗和独立运动,自瓦哈比派兴起以来从未间断。日本著名学者依田憇家认为,日本成功的核心经济因素之一是国内形成了统一的市场。¹按照这个观点,奥斯曼土耳其近代化过程中主要的缺失是没有形成国内统一市场。欧洲和世界经济的冲击,由商业上的冲击到财政上,最后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整体冲击,外部因素(如出口价格、信贷的获取等)直接影响着奥斯曼帝国的经济。^④还有,奥斯曼社会的文化教育落后,没有高效率的政府,也没有指导本国经济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奥斯曼帝国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少数民族,如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等,他们主宰城市主要的经济部门,也控制着农村地区,但这些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不高,不能够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应该看到,影响土耳其近代化的还有一些特殊因素(或曰特殊的问题),即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宗教因素、被卷入世界大战。

首先,地理位置紧邻欧洲强国,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很早就开始冲击奥斯曼帝国经济,致使本地手工业被欧洲竞争挤垮,而农业出口是对欧洲需求的回应。欧洲的企业家和欧洲技术进入帝国,促进了帝国经济的发展,当然也便利了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和政治控制。外国对奥斯曼帝国经济、政治的控制比世界其他地区都严重。例如印度只屈服于英国一国的完全控制,而奥斯曼帝国政治上虽未丧失独立,经济上却受到英、法、奥匈、意等多个国家控制,导致社会发展受限,使土耳其人产生深刻的挫折感。当然,也要看到另一方面:在东亚的中国晚清帝国面临被瓜分危险时,奥斯曼帝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英、法的保护。帝国北部强敌俄罗斯不能实现其野心,并非奥斯曼帝国的强大,而是欧洲其他强国抵制着俄国。尽管英法不希望奥斯曼帝国分裂和崩溃是出于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考虑,但客观上使奥斯曼帝国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局势。

其次,宗教因素对土耳其社会有很大影响。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教国家,伊斯兰教既是宗教又是法律、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伊斯兰教深入社会各个层面。伊斯兰教对经济发展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影响,有时甚至制约经济的发展。宗教势力曾是推动奥斯曼帝国扩张的动力,但也是土耳其改革和近代化道路上的阻力。亚非拉国家的近代化,很少像奥斯曼土耳其一样,受到宗教因素的严重影响。

再次,不管奥斯曼帝国多么衰弱,如果不是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也许不会那么迅速地瓦解。奥斯曼政府向协约国宣战后,英国和法国迅速派军队进入中东。奥斯曼帝国战败,按照条约被彻底肢解,统治西亚北非和巴尔干长达600余年的大帝国,至此完全崩溃。耐人寻味的是,19世纪英法两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曾努力维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但一战后英法两国同样为了自己的利益,却在原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上任意勾画、分割。奥斯曼帝国瓦解前是列强的争夺目标,瓦解后也是列强抢占的目标。

结 论

在奥斯曼帝国处于“自身衰败”和“半边缘化”的过程中,土耳其统治者开始了旨在挽救危亡的西化改革。这样一个过程与中国晚清的历史相似。改革的内容和方式起初只引进“器物文明”,不触及制度和观念,并认为只要建立现代工业就会变成工业强国,一旦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就会使国家富强,一旦富强就会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如果单从受到工业文明挑战才做出反应,并积极向西方学习的现象看,土耳其与日本也是相似的,只是改革的结果完全不同。如从受到西方列强侵略,最终被列强占领的过程看,土耳其与印度的命运也类似,只是前者维持了主权而后者沦为殖民地。急功近利的追求,认识上的偏差,过高的期望值,也是落后国家的近代改革共有的毛病。因此,本文认为土耳其近代化道路并没有特殊之处。

¹ [日]依田憇家著,卞立强等译:《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0页。

^④Roger Owe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and Co. Ltd 1981, p. 292.

影响土耳其近代化的不利因素从表面看与东方其他国家也有相似处,如经济基础薄弱、改革走了弯路、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些必备条件等,但实质上差别是较大的。经济基础薄弱的程度不同,改革的弯路也有大挫折和小挫折之分;改革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从塞利姆三世的改革算起到凯末尔改革,土耳其有一百余年的改革实践,而日本、中国晚清的改革则没有如此持久。关键的差异是,奥斯曼帝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奥斯曼土耳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形势。与欧洲强国为邻利弊相间。简单地说,很早接触到西欧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观念,这是益处;与欧洲国家交恶,受欧洲大国侵略、控制甚至裹挟,这是不利之处。辽阔的国土、优越的战略地位,使奥斯曼帝国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但列强之间的争夺,又使奥斯曼帝国侥幸维持了主权。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教国家,近代化过程中还受宗教问题影响,同一时期的中国晚清和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影响。最严重的问题是奥斯曼帝国外交政策失误,被德国和奥匈帝国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战争结束之日,也是奥斯曼帝国被列强肢解之时。如果不卷入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未必速亡。当然,没有旧帝国的瓦解,就不可能有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也不会有凯末尔的革命和现代改革。凯末尔革命和世俗改革的前提有两个,一是旧帝国灭亡,二是已有一百多年的改革实践。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研究看,凯末尔革命之后土耳其共和国的现代化,既立足于早年改革的基础,也承载着中东地区特有的问题。

责任编辑:宋 鸥

Modernization of Turkey: The Common Way and A Few Particular Problems

WANG San-y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reform aiming at enriching the country and strengthening national defense carried out by elites in the Ottoman Empire initiated early modernization of Turkey, wher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society to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took place. This was the common choice and common way that other backward countries had undergone. However, the problems that Turkey had encountered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to the birth of modern Turkey a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other countrie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 are as follows: in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changing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unsuccessful self-improvement; a large resistance to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urkey's semi-marginalization in world system. It is the specific geo-strategic position, peculiar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factors and the serious consequences of involving World War I that determine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Turkey.

Key words Turkey; early modernization; common way; particular problems